

西南民族研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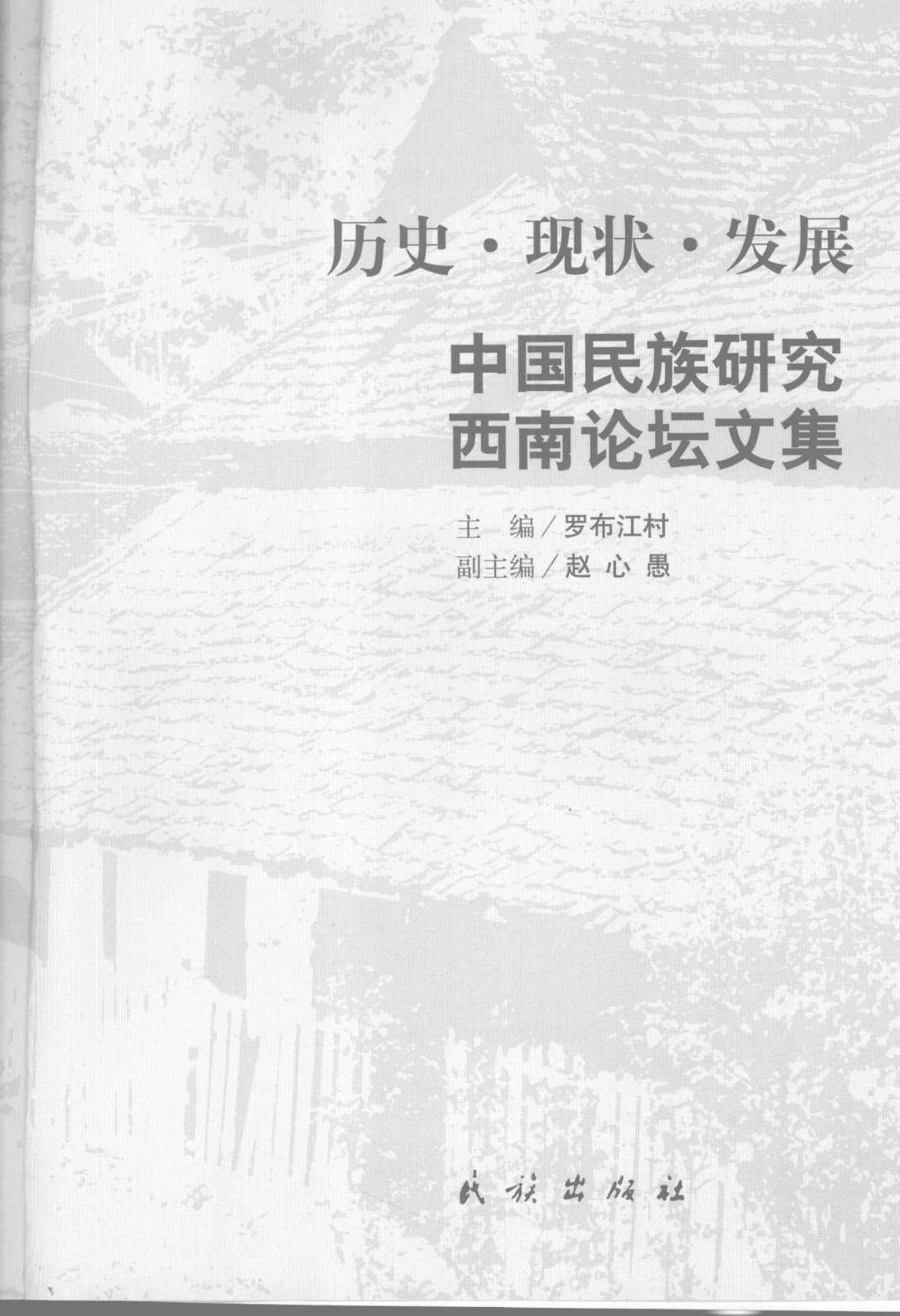
历史 现状 发展

中国民族研究 西南论坛文集

主 编 / 罗布江村

副主编 / 赵 心 愚

民族出版社



历史·现状·发展

中国民族研究
西南论坛文集

主 编 / 罗布江村

副主编 / 赵 心 愚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现状·发展：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文集/罗布江村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12

(西南民族研究书系)

ISBN 978-7-105-09098-3

I. 历… II. 罗… III. 民族地区—民族发展—研究—西南地区—文集 IV. K2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4014 号

历史·现状·发展：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文集

-
- | | |
|------|--|
| 编 者 | 罗布江村 赵心愚 |
| 策划编辑 | 倩 男 |
| 责任编辑 | 杨蜀艳 |
| 责任印制 | 石小娟 |
| 封面设计 | 吾 要 |
| 出版发行 | 民族出版社 |
| 网 址 | www.mzcbs.com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3 |
| 印 刷 |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
| 版 次 |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
| 印 次 |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
| 印 数 | 1 ~ 1500 |
| 开 本 | 32 开 |
| 印 张 | 11.875 |
| 字 数 | 31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105-09098-3/C · 267 (汉 243) |
| 定 价 | 35.00 元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010-58130038；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目 录

- “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综述 /曹辉林 何文海 /1
- 南诏与吐蕃的矛盾及联盟关系的变化
- 异牟寻帛书的初步研究 /赵心愚 /11
- 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 /方素梅 /25
- 清代新疆民族史研究综述 /苗普生 /43
- 印度东喜马拉雅民族与中国西南藏缅语民族的历史
- 渊源 /何耀华 何大勇 /61
-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译后记 /杨 铭 /75
- 简述四川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秦和平 /81
- 1950—1960 年在民族政策治理中的四川康区
- 社会变革 /郎维伟 张晓红 /117
- 云南民国时期民族教育政策探析 /马廷中 杨 波 /150
- 藏、彝支民族族源探 /宾秀英 洛珠桑姆 /162
- 继承与创新之路
- 新疆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考 /田卫疆 /180
- 后现代性与移动性：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挤压
- 兼论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文化”
- /彭兆荣 /189
- 现代传媒条件下对稻城亚丁话歌谣等民族民间
- 文化的传承发展 /张 超 /205

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关系的

实证研究 /郑长德 /218

人口流动与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陶斯文 杨 风 /242

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

——以渝东南小南海旅游区为例 /沈再新 程 芳 /252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民族平等问题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

/王允武 田钊平 /267

四川彝族社会性别关系变迁研究的思考 /马林英 /294

川滇叙永、威信邻区苗族服饰文化释义 /马太江 /302

后藏重镇江孜城的历史聚落与城市空间变化 /尼玛扎西 等

/320

地方性知识与藏区教育的人类学思考

——对藏区教育“另类”个案的田野考察 /郭建勋 /337

拉萨市木如社区青少年网络生活调查研究 /王万宏 /348

在“原生态音乐热”中促进羌族原生态音乐文化的

保护与发展 /李 珊 /361

后记 /375

“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综述

曹辉林 何文海

由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的“历史·现状·发展：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于2007年4月14日至15日在西南民族大学顺利召开。参加本次论坛的有来自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中南民族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及西南民族大学等2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余名专家学者。论坛收到论文50余篇，大多具有比较高的学术水准。

会议于4月14日上午9时正式在西南民族大学办公楼学术会议厅举行，开幕式由西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赵心愚教授主持，西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罗布江村教授和《民族研究》杂志副主编刘世哲编审分别致辞。开幕式后，首先由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陈玉屏教授、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等依次作专题学术报告。在此后的一天半时间里，先后有近20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作了学术发言。学者们向本次论坛和所作的大会发言，主要围绕着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

史的理论研究、民族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遗产保护等主题展开。现将本次论坛所涉及的议题及其主要观点大致归纳如下：

一、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相关问题探讨

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以及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研究及存在的问题，是本次论坛的议题，也是到会学者深入探讨的议题之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教授在专题学术报告中，提出了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史上，除了南方学派、北方学派外，还有“华西学派”，并就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渊源背景、形成和发展及其特点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相对于北方学派、南方学派而言，华西学派的特点是包括了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等多学科的结合，而且推动该学派学术活动的主要学术骨干既有中国学者，也有当时在成都高校任教的外国学者。他认为梳理和总结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与经验，有助于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的发言认为，中国的人类学，与西方诸国不同的学术传统相联系，形成了自己的区域传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形成了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的“南派”、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的“北派”及以华西大学为中心的“华西派”。王铭铭同时提出，在过去 25 年来的学科重建分别归功于南方与北方，南方的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促成人类学的重建，北方的中央民族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促成了民族学的重建。之所以形成南北学科的不同，可能的解释是与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传统有关。他说，抗战期间，学者都到了西部，并从事边政问题研究，边政学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主流，也为 1949 年以后的民族研究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抗战胜利后英美派的知识体系在国民政府学科分类中建立的支配地位，也改造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使之从民族学转入文化人类学。这两个南北学科传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得到了延伸，即从边政学到民族研究这一脉，支撑了过去 25 年来的民族学；而民族学到文化人类学这一脉，支撑了过去 25 年来的人类学。王铭铭还用“中间圈”的概念来分析目前的“民族研究”，他说，“中间圈”的人类学研究，在过去 10 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果是，民族志之所指，从一个官方承认的民族的整体社会形态的历史叙述，转向了对于一个小范围的时空单位进行的人文描述。其次，“全球化”话语的迅速传播，甚至可以说，“全球化”话语已在“中间圈”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再次，海外中国人类学的西进与族群理论的兴起。在国内学者对于“民族”概念的讨论产生厌烦之感后不久，“族群”这个也不是十分妥帖的新名词被广泛地运用于“中间圈”的研究。这个新概念的简单套用，使不少“中间圈”的人类学研究沉迷于话语理论的重复论证。“中间圈”出现的这些变化，本身构成一种新民族学，这种新民族学在方法论上不同以往之处，主要在于更强调经验资料的搜集，其主要创新在于使民族研究不再沉浸于政策话语的论证，而转向对于村庄、族群等“研究单位”，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形成的关系之“客位”研究。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的大会发言，主要就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范式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他回应了李绍明研究员和王铭铭教授关于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观点，他认为“华西学派”的概念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强调研究西南的范式问题很有必要。关于西南研究，徐教授主张以国家叙述与本土话语之间来看，范式之间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单线进化发展而是多元并存的，更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开放的结构来看待西南研究

的不同范式，或许这样更有利于西南研究的学术繁荣。这些学术发言本身构成了论坛的对话，同时反映了学术界对目前民族学、人类学乃至西南地区民族学研究内部存在问题的反思与内省。

二、关于民族关系与民族历史问题的探讨

民族关系与民族历史问题也是本次论坛受到关注和讨论的主题之一。不少的学者意欲从历史上王朝中央民族政策探讨的角度，力求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乃至现代国族建构的理解。西南民族大学陈玉屏教授在题为《论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的建构》的发言中明确提出，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的建构，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在对民族历史记忆建构的功能、作用进行阐释和分析后强调，正确认识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的建构，对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十分重要，因此，在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既要注意民族斗争、民族压迫历史记忆的建构，还应更加注意民族友好与民族和睦历史记忆的建构，但不能因为政治目的而歪曲历史事实。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的学术发言，结合《新唐书·南诏传》中有关异牟寻致唐剑南节度使韦皋的帛书，揭示南诏与吐蕃的矛盾及联盟关系变化的历史线索，提供给人们理解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极具价值的历史记忆。中央民族大学胡绍华教授的发言认为，汉朝治理西南民族的政策，不仅对西南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具有深远的意义，为后来各代中央王朝所沿用、发展，而且对制定当今的民族政策皆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从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角度对我国目前民族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发言中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应该

有全球视野，应该清楚多民族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样，一些国家的族群理论、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可以借鉴，可以成为我国民族研究者探讨当代中国民族现状的镜子。他同时认为，国际上出现的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些因素，在国内也可能存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会影响少数民族对祖国的向心力问题；盲目的发展带来的生存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民族文化的消失可能带来的民族关系的紧张问题；一些跨境居住民族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而面临新的挑战问题等，都是国家建构和谐社会、谋求长治久安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云南大学方铁教授的发言，从探讨历代封建王朝的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切入，认为羁縻政策、土官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国的重要创造。羁縻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以较宽松的统治形式，与边疆各民族建立起政治的统一体关系，逐渐通过加强联系与封建教化，最终确立了中国的历史疆域。土官土司制度的施行，则有效地培养了南方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增强了南方各民族对内地文化的认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何耀华研究员，通过对印度东喜马拉雅民族的迁徙历史、文化习俗、地方语言等的研究认为，印度东喜马拉雅民族和中国西南地区操藏缅语的民族有历史渊源关系，这是发展中印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来自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张兆和教授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强调中国民族学界应该重视对近代少数民族自我族身份认同表述的研究。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讨论，绝大部分是基于汉族精英所主宰的民族主义的论述，在现代中国国族建构和民族主义的发展中，少数民族的精英以汉语表述我族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边疆地区土著群体在参与现代国家体制中的调适。若能将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个案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将会大大增加我们对现代中国国族建构和民族主

义的理解。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的发言，回顾并分析了四川民族地区实施民主改革的过程、措施和特点及主要成就。认为民主改革是四川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一次重要变革，是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及民族关系变化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举措。为我们理解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民族政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学者们的这些见解，有助于我们从多个角度加深对民族认同、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理解。

有多篇论文及学者的大会发言涉及民族史学科的发展问题，在这些论文和大会发言中，既有对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民族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也有对区域性、地方性民族史研究的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罗贤佑研究员在为大会提交的《略论建国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文章中，回顾了建国以来民族史研究所经历的不同历史阶段以及形成的不同学术特点，指出改革开放后，由于实事求是学风的发扬，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学术空气的活跃，以及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使中国民族史研究取得空前的进展，呈现出极度繁荣的局面。主要表现在：①对重大民族史理论问题展开讨论；②拓展民族史研究领域；③科研、教学力量发展壮大；④成立有关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团体；⑤学术成果大量问世，包括综合性民族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族别史、民族专史、疆域史、民族关系史以及 55 种少数民族简史等。罗贤佑研究员还指出，理论方法建设、跨学科研究、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历史学人的培养等，是民族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方素梅研究员在大会上作题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现实作用和意义》的发言，也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族史的研究获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进入繁荣发展的时期，表现为不仅出版、发表的论著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涉及的范围广，更主要的是形成体系，

具有理论深度。新疆社会科学院苗普生研究员结合清代新疆民族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向大会介绍建国以来新疆地区各民族历史研究的所取得的成果。他说，新疆民族史的研究，从清代中后期就开始了，它与清代西北舆地学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新疆民族史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近 5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取得的。此外，西南民族大学杨铭研究员的《吐蕃统治敦煌史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四川大学石硕教授的《“蜀曰邛”：古蜀国的邛人及其相关问题——蜀地邛人与越西郡邛都夷关系探讨》等论文，都从某一研究领域或历史事件展开对民族史研究的相关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三、关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现状问题探讨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现状问题也是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重点探讨议题之一。在会议上所作的学术发言以及提交的论文中，涉及民族地区宏观的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与文化保护、生态移民、教育等问题。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在大会专题发言中，结合他近年来在西南民族地区所进行的课题研究心得，用实际案例解剖和分析了目前西南地区地方政府进行文化产业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西南民族地区，以文化引导发展的是一条不可回避的途径，所以要加强对策研究和引导。最后周大鸣教授对西南民族地区以文化引导发展给出的对策建议是，要建立和完善当地人参与发展的机制，实现民族文化的资本化，实施特殊的发展政策。云南大学和少英教授给大会提交的论文认为，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并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毋庸讳言，由于历史遗留以及现实所形成的矛盾与困难太多，贫困面大、生

存环境恶化以及同其他地区间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尤其是在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若再不加以足够重视，并通过加大国家投入和发达地区帮扶的力度，唤醒各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以促进自身发展等方式予以解决，则还有可能引起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弱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锦研究员的发言指出，国家启动的四川横断山区的生态移民从本质上讲是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生态移民目标的双重性，使它面临生态环境影响，移民贫困化，传统文化多样性流失的风险。只有树立创造发展机遇的指导思想，建立弥补移民所有损失的政策保障，保障移民参与确定合理的发展方式，提供保障迁移和生活水平恢复的资金支持，建立对全过程全面负责的机构责任制，实现文化圈内优先，以化解文化冲突等措施，才能真正达到目的。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田卫疆研究员的发言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强势文化在网络里大行其道的今天，处于主流文化发展边缘状态中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他从分析新疆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轨迹入手，概括了新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若干特点，并研讨了这些特点同现代化的调适关系。指出社会各界应该对于西部大开发中的新疆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认为新疆民族文化本身只有走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在未来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得到进步，并发挥其作用。西南民族大学郑长德教授的发言，集中探讨了西部金融中介的发展和农村贫困减缓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经济体贫困的变化取决于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状况、收入分配的变化、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利于（或不利于）减贫的各种因素。而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改进收入分配，从而减缓贫困；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罗凉昭副研究员结合她的实地调研，认为对目前在四川民族地区各大河流进行大规模水电站建设，

所带来的移民、生态环境等问题已经造成某些社会关系的紧张，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文化多样性，在发展的前提下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问题，也同样成为本次会议所关心的议题。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的大会发言中，以福建南音的世界遗产申报文本为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空间”作了论述。他认为，“文化空间”除了地理上的空间聚落形态之外，还应该包括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即在一定的时空聚落中，某一社群世代相传的、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空间。彭兆荣教授还指出，人类学的文化理论、概念以及研究方法应该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使传统文化保护能够收到实效。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在提交给论坛的论文中，结合对贵州“村寨/露天博物馆”建设项目的调研，强调对已经有 20 多年时间的“村寨/露天博物馆”实践的研究，探讨其文化保护的方式与措施以及所起到的文化保护效果，对国家正在实施的“文化保护工程”乃至文化多样性保护工作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刘夏蓓副教授通过对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文化变迁是造成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始终伴随人类的恒常运动，文化变迁受制于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变迁，在变迁动力与变迁层次方面有自己的规律性。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是始于宗教信仰的，其文化变迁梯度与变迁防御层次表现为从精神到制度再到物质，这种适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变迁和防御层次，使我们了解到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变迁的规律性。此外，还有不少的论文对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探讨。这些探讨可以理解为是民族学、人类学界对文化多样性命题的关怀和回应。

本次论坛虽然时间不长，但所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正如作论坛总结发言的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所说，这次论坛实质上是一次重要的国内民族学、人类学学术交流和探讨的盛会，也是为明年在昆明召开的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大会的一次准备会议。它的特点表现为：第一，论坛的内容极为丰富，涵盖历史、现状、发展及对策等多方面；第二，这次论坛的报告和论文大多有创新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第三，这次论坛比较关注对我国民族的现状和发展对策的研究，提出的问题及对策均有现实意义。因此，周伟洲教授还代表与会的专家学者提出建议，希望西南民族大学和《民族研究》杂志社能将“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继续办下去，给全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南诏与吐蕃的矛盾及 联盟关系的变化

——异牟寻帛书的初步研究

赵心愚

752年（唐天宝十一年），南诏与吐蕃公开结成战略联盟，在西南地区共同对付唐，阁罗凤被吐蕃册封为“赞普钟”，并以此年为南诏“赞普钟元年”。^①几十年后，794年（唐贞元十年），西南地区形势出现根本变化，异牟寻亲率南诏军队破吐蕃于神川，夺取滇西北地区铁桥等十六城，降其众十余万，并遣使赴唐献捷。^②从天宝十一年到贞元十年，南诏与吐蕃结成的战略联盟仅维持了四十余年，双方最终兵戎相见，南诏转而与唐恢复关系。南诏与吐蕃结成联盟后，双方相互支持，协同作战，曾使唐在南线十分被动，但也存在一些矛盾。究竟有哪些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又为何激化，双方为什么反目成仇，这是南诏与吐蕃关系史中的重大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① 《南诏德化碑》，载《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重要碑刻录文》，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② 《旧唐书·南诏传》；《新唐书·德宗纪》。

南诏史的资料较少。有学者曾言：“南诏史资料历来贫乏。”^①在十分有限的资料中，出自南诏的有关南诏与吐蕃关系的资料就更显不足。在相关的研究中，学者们都十分重视《南诏德化碑》。的确，此碑所记是南诏人留下的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极高，有的记载可补汉藏史籍记载之不足。但是，就南诏与吐蕃关系而言，此碑存在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此碑立于阁罗凤在位之时，碑文记事止于765年。从时间上看，距离双方公开结盟仅十多年，所记的只是南诏与吐蕃结盟经过和结盟前期的情况。双方结盟关系的中、后期，尤其是异牟寻继位之后的情况，此碑不可能有记载；二是此碑公开立于南诏太和城中，碑文中有不少内容所反映的是南诏与吐蕃当时十分密切的往来和南诏对吐蕃支持的感激之情，不可能记载双方的矛盾和南诏对吐蕃的不满。因此，《南诏德化碑》中的材料对研究南诏与吐蕃结盟经过和结盟前期的关系非常重要，但研究南诏与吐蕃结盟时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后又为何激化，南诏最终为何背蕃归唐等，显然还要求证于其他的材料。除唐人与吐蕃人的记载外，尤其需要出自南诏的其他材料。

《新唐书·南诏传》中，有异牟寻致唐剑南节度使韦皋的帛书一封。如果说《南诏德化碑》所记是出自南诏人的研究南诏与吐蕃结盟经过及前期关系的重要材料的话，那么，异牟寻这封帛书就是南诏人留下的研究南诏与吐蕃结盟关系中、后期及双方结盟时的矛盾和之后矛盾激化原因的重要材料。方国

^① 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63。